

重温《讲话》精神 繁荣文艺创作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年前指明了中国现代文艺的正确方向,其论断由于切合了文艺的本质属性,因而构成不变的真理性质,该文遂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7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迈进新民主主义进而达到了初步社会主义小康阶段,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所面对的外部世界都已经与以前截然不同,《讲话》的有效性还能继续维系吗?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能否摆脱《讲话》

我从《讲话》受益极多,面对《讲话》发表70周年来临,心潮起伏,有话要说。目前要宣传《讲话》精神,是很有利条件的。例如:提倡“走转改”以后,记者到基层,反映了新情况、新气象、新困难以及群众的新期望,电视节目面貌一新,不是一般的、概念化的老调子,让人感动。这就是继承、发扬了《讲话》精神。又如,报刊提倡深入职工,深入工人群众,也有重大意义。工人群众近年来似乎被边缘化了,反映少了。去年《文艺报》多次提到这个问题,让文艺工作者深入职工,工人阶级不应在文艺作品中缺失。在解放战争年代,我写了三部反映工人生活、生产的剧本:《反对三只手》《里外工人》《红旗歌》,还有一批诗歌、歌词。周扬称《红》剧是“第一个表现工人生产的剧本”。当年我开拓了表现工人、工业题材的路子,它们表现解放前工人的苦难史和解放后工人以主人翁观念积极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快速胜利。现在提倡深入职工群众,我是极为赞扬的。再如:中国作协采取措施组织作者较长时间深入生活,而不仅仅是采访、采风,这就是和《讲话》要求深入生活相一致的。以上种种新气象,就是在新时期继承、发扬《讲话》基本精神的,这些都说出了我要说的话,我为之衷心欢呼。

在此,我想谈谈写作被称为“红色经典”的《红旗歌》等剧本与深入生活的关系。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市。这是解放战争由战略撤退转入战略反攻后在全华北、全中国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我们怎能不急于前去拥抱它、亲吻它呢!我们华北联大学校领导立即派我和创作伙伴陈藻森来该市深入生活,参加大兴纱厂接管工作组,做一名实际工作干部,无条件地服从接管组领导分配的任何实际工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复厂、建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同时,开展肃清反革命,巩固新的人民政权,所谓“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我不懂生产技术与生产,自然就是参与政工与宣教方面的工作了。

大兴纱厂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染缸”政策,发展大批工人参加了国民党,也建立了“中统”特务组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受骗上当或被逼,并未参加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的活动。按党的政策,只要他们坦白交代、主动登记,我们就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过去,我们下乡村,下连队,工作对象是农民和子弟兵,彼此间有深厚的革命感情。但如今,面对的是工人阶级,我们党本阶级的成员,是我们党在过去“农村包围城市”20年间与我们隔断了联系,在国统区受苦受难的工人兄弟姐妹。因此,现在一见到他们就有一种天性般的、血缘般的阶级亲情,想和他们亲近。我们对他们讲:你们受尽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欺骗,今天迎来了本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应该尽快回到自己的阶级队伍中来。这样的工作态度,确实能真诚地感动他们,不仅很快地交代了问题,还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解放前的旧厂方、旧工会、国民党市党部和基层街区政权给他们造成的重重苦难。他们讲来动心、动情,作为他们的阶级兄弟的我,听来感同身受,热血沸腾。对国民党的累累罪行我急于控诉揭露,因此就很快写出了

本报(记者 余义林) 辞赋这一文体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当下如何让这种体制典雅、辞藻考究、笔势华丽的古代文体融入社会生活?怎样提高辞赋创作的艺术价值?如何评价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辞赋写作热潮?近日,由中国辞赋学会、洛阳辞赋研究院举办的“辞赋之都”授牌仪式暨海峡两岸地域文化与辞赋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洛阳举行,与会者深入探讨了这些话题。洛阳辞赋研究院院长孙继纲说,有人认为辞赋就是铺排斐丽、歌功颂德,这其实是理解上的偏差。辞赋的本质并非仅仅是抒情,而是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在当下的辞赋创作中,要特别提倡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这样才能让辞赋创作真正繁荣和发展。山东大学教授刘培认为,辞赋创作历来与文学精神结合紧密。在其诞生的先秦时期,社会呈现出动荡、变革的格局,那时的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辞赋中也有歌赞颂章的现象,但更多的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对目前的辞赋创作来说,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在观照现实的同时,回归到文学的本位。

台湾学者范光陵说,辞赋文化在洛阳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洛阳文化的一个“亮点”。20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辞赋创作与研究逐渐沉寂,但目前正在复兴阶段。继承传统是辞赋立身之本,创新发展是辞赋的繁荣之路。辞赋创作难度很大,需要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当代辞赋作家要写出好的赋作,需有创新意识,做到古今结合。与会者对此深表赞同。大家表示,“辞赋文章能者稀”,但辞赋本身彰显了汉语语言的魅力,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中断的脉络。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应通过研究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增进交流,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的笼括?带着这个假设,我重读了《讲话》的理论精髓,惊讶地发现其中确立的文艺立场问题,也正是今天的文艺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尽管今天的社会基本任务已经从民族战争转移为持续性的经济建设,基本目标已经从反帝反封建转移为民族复兴,文艺的基本任务也已经在动员和鼓舞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转移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然而,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文艺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要以占全人口

践行《讲话》,深入生活,丰收《红旗歌》

在全景规模上表现我国工人阶级苦难史的第一部话剧《里外工人》。这戏的内容,是解放前的旧生活,我从未亲历亲见,当然谈不到“深入生活”,但是以我的心、我的情写出了它们的真实性。因此,近年来,刘厚生、黄维钧、崔道怡、赵心亮、雷从俊等等诸多评论家在《文艺报》《剧本》《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发文,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肯定。

1948年2月,我所参与的“挖蒋根”工作结束后,我被领导分配做工会系统的宣教工作。眼前正开展的所有新生活,对我这个第一次下工厂的年轻知识分子都是新颖的,我如饥似渴地想投入它们。纱厂里男女青工多,在获得解放的新生活中,很喜欢唱歌,我就利用他们上班前或下班后的空闲时间教他们唱歌。于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打垮反动派》以及我作词的《打到南京去》等一系列革命歌曲传遍全厂。我给他们“上大课”作政治时事报告,二百人的大课堂里,没有扩音器,全由我高声运送,结果引起胃疼,吃不成午饭。我们邀请有文化的职员给他们“扫盲”,提高文化。我们工会主席派我去分厂(毯织厂)蹲点,筹建分工会。我们接管组里从老解放区来的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时也被厂方或党委书记调去应急使用。如有一次,毯织厂分厂有技术的老工人向我们总厂厂长状告从工人提拔起来的分厂负责人不懂管理,上下级闹矛盾,厂长就派我去那里蹲点作调查,向他汇报,代他处理。又如有一次,电厂分厂发生了所谓工人党员反对党支部书记和分厂长的“严重反党事件”,党委书记考虑要处分党员,就派我去那里上班,调查研究。结果我发现是支部书记和分厂长不懂电机技术,压制了两名党员电机工人的正确建议;而这两名党员技工是解放前地下党时期留下来的党员,不懂得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犯自由主义,在党外群众中散布反对、嘲弄支书、分厂长的舆论,打击他们的威信。我认为这够不上是反党事件,不能单方面处罚工人党员。向党委书记汇报后,书记召开党内组织生活会,双方各自作自我批评,解决了问题,阻止了一场冤案发生。厂长和党委书记是把我当成动力量来使用的。而我这枚棋子,也就任领导怎么摆,我就怎么走,不讲个人兴趣,只要对工厂有利,叫我做什么我都乐于服从。或者说,我对这一切新鲜事物都有好奇心,事无巨细,都想了解,参与实践。领导让我去做那部,正好给了我实践机会,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所有这些,扩大了我深入生活的领域,拓宽了我的生活知识,丰富了我的感情体验和和对各种人物的了解,为我积累了创作资源。当年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坚固的看法:一个青年革命者,首先应当做实际工作,为推翻三座大山、缔造新中国作贡献,而这时同时就是为创作打基础。而且我至今自认为,我当年就是遵照《讲话》所说“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

工农兵中去”的,我至今引以为自豪,无愧无悔。因此,我才能执笔写出了《红旗歌》等戏剧、诗歌、小说等作品。不仅如此,我还主动争取参与更繁重甚至危险的工作。如,1948年10月下半月,石家庄解放将近一年,大兴纱厂的生产早已恢复正常并且开始扩大,一派繁荣景象。但此时,盘踞北平的傅作义反动部队要来偷袭石家庄,为此全市投入备战斗争,大兴纱厂要拆下部分重要机器、机件运往老解放区暨壁起来,免遭敌人破坏,待将来再运回重新安装。一天午后,我偶尔来到发电厂后院,看见一段墙被拆断成一个豁口,几名从老区来的行政干部带领二十来个青年男工,把已打包好的机件往墙豁口外搬运,正停在那里的火车车厢里装车。而此时,正有两架敌机在本市上空轰炸。我一看情况紧急,马上投入他们一起搬运。这时,两架敌机飞临我们上空,转圈、扫射,构成巨大威胁,但我们只是暂时趴伏地上,并不逃离,待敌机飞走,接着再猛干。我不是行政干部,这些事本与我无关。但此时,此事已是全厂最重要的第一线工作,我为了尽自己作为革命干部的一份责任,就主动参加了。在把机器装上火车后,我便向党委书记请缨,并得到批准,参加押运机器工作组,去老解放区涞水县农村暨壁机器,工作了半月,到备战结束又把机器押运回厂来。如此,完成了既为革命工作出力,又为创作积累新材料的双重心愿。纱厂党委满意我的工作表现,为我作了政治鉴定,送给我们华北大学(原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建成)党委,建议批准我参加共产党的申请。我的申请很快被批准了,并且在纱厂举行了入党宣誓,更加强了我是纱厂职工中一员的自我感觉和对纱厂的热爱。

我以上深入生活的方式收获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熟悉了人。我和纱厂职工特别是男女青年建立了阶级兄弟姐妹般亲密关系,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熟悉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为当时我从事通讯、诗歌、小说、剧本写作储蓄了人物印象。今仅举个别事例。一天上半夜,一位来上“下夜班”的女工来得早,和我在“工务部”办公室聊家常。她心直口快,说她家在郊区农村,丈夫参加了解放军,驻扎在河北省北部某县,给她来信,叫她去“探亲”。但她不想去。她说:丈夫参军前,小两口去地里干农活,丈夫有时就把她按倒在庄稼地里作爱,结果被同在地里干活的老公公发现,闹得老公公后来就不敢和他俩一起去干农活了,等等。她说:“我们都有儿子了,他还缺什么呀?……老鲁,你替我给他写封信,说我不去!”对这样的知心话,我自然劝她去,并告诉她:你是“军属”,厂领导会批准你“探亲假”,还给你照样发工资。又如有一次,我写了长诗《在轰炸下》草稿,歌颂工人和市民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坚持生产的英雄主义豪情。我给女工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启动

本报(记者 徐健) 日前,王健、陈萨、杨雪霏三位蜚声国际的华人音乐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拉开了2012年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序幕。音乐会在维瓦尔第的《双小号协奏曲》中开始,这首维瓦尔第唯一的双小号协奏曲,由国家大剧院铜管乐队演奏十分少见。大提琴家王健还分别与杨雪霏和陈萨合作,带来了四首风格各异的音乐小品。从埃尔加《爱的致意》到皮亚佐拉的代表作《咖啡间1930》,从法利亚的《西班牙舞曲》到舒曼的《柔板与快板》,音乐家们将富于创意的灵感和绝妙的改编赋予了这些人们所熟悉的乐曲,让观众领略了室内乐活潑灵动的另一个侧面。

在开幕音乐会之后,一直持续到5月26日的五月音乐节还将为观众带来14场精彩的室内乐演出,巴什梅特、乔纳森·科恩等十位音乐家以及九支“室内乐黄金组合”都将把天壤、创新、灵感带进本届五月音乐节,本届音乐节还将走进城市不同角落,带来21场完全免费的公益性演出。

《命定》以别样视角书写抗战

本报(记者 王觅) 由四川省作协、中共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合主办的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梅,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吕汝梅,中共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毕世祥和部分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

《命定》讲述的是藏族军人参加远征军、与汉族人民一起抗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文艺家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要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这些论断,难道不正阐明了我们今天的文艺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吗?而当下文艺所一再遭遇的社会诟病也正来自它的立场问题:文艺在为谁发声?文艺体现了谁的审美情趣?文艺遵循谁的道德准则与行为宗旨?今天的文艺批评,也自然面临着与70年前截然不同的文艺新环境与创作新状态:信息爆炸、文化多元、传媒壅塞、受众分化,

廖奔

鲁煤

积极分子小青年闫金芬和费月梅看了,她们说好,但马上开玩笑说:“给刘国弼去看看,听他怎么说!”刘国弼是中年男性会计师,厂有名气的老实人,最胆小,怕轰炸。这是她二人建议我们合作搞恶作剧,去嘲弄、羞愧刘国弼。而我竟对此感兴趣,真的给他送去了。两天后,我来征求刘国弼的意见——出我意料,他竟满脸严肃地说:“读了这诗,就不怕轰炸了!”由于我对闫金芬性格的深刻了解,后来把她当做原型,写成了《红旗歌》中的女工党员金芬这个人物。

我做的各种工作和接触的各种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增加生产、支援前线”。也就是为了尽快打垮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这就使我当时时刻关注细车间正在开展的红旗竞赛运动,关注运动中男女青工们的喜怒哀乐和性格表现。为了理解他们,我也到车间里学会了简单的看车“接头”技术。每天深夜,我在业余时间疲倦后,入睡前,往往去车间转一圈,享受那里机器的轰鸣、工人紧张热烈的劳动气氛和红旗耀眼的喜庆场面。但那里也正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积极工人嫌落后工人拖累他们得不到红旗而争斗;留用的旧管理人员仍沿用旧的单纯行政命令、任意处罚工人的作法处理以上矛盾,结果是火上加油。这就需要从老区来的管理干部、工会干部和先进工人做大量工作:教育落后工人认识到解放后自己已成了工厂的主人,应树立积极的劳动态度;帮助、教育留用人员学会实行民主管理;更要关心和逐步提高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从党委书记、厂长到我这样的小青年最揪心的事情,最需要解决的决定命运的关键问题。于是,我和创作伙伴就以此为中心,以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中不同性格的人物为原型,生发出了《红旗歌》中人物、主题和情节结构。我们坚信这是剧本的最佳方案,它将使即将解放的国统区各大城市的人民看到:共产党是爱护人民的,是讲人性的,是提倡民主的,我们借此驳斥国民党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不讲人性的反动宣传。

大约是在1949年1月,《红》剧写出初稿,党中央领导文艺工作的周扬同志竟是第一看稿人。他接见了我们作者,充分肯定此剧,同时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剧中性格暴躁的女工大梅,我们原写成是旧工头的女儿,写出出身不好才性格不好。周扬说不必写旧工头的女儿,就写她是个性缺点,其用意大约是避免不利于旧工头的团结、改造。第二,周扬要求剧本中写好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思想教育作用。他并说,日前《石家庄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我的短篇小说《双红旗》的好处,就在于它第一次表现了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教育作用。第三,他建议把《红》剧中写的红旗竞赛的戏剧背景,改为以不久前反对反动军队要来偷袭石家庄、我军民进行的“备战运动”为剧情背景。他马上

2011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蓉城揭晓

本报(记者 王觅) 2011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日前在四川成都揭晓,诗人阳飏、谢小青和诗评家罗振亚获得这一奖项。由星星诗刊社、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联合举办的年度诗人奖评选活动已经持续了5年,该奖每年评选一次,评选对象为本年度在中国诗坛有较大成就的诗人及诗评家。擅长抒写西部的阳飏,从未离开过对他熟悉的西部大地,组诗《山河多黄金》以“西部”为背景,把对自然与人的理解化成温暖、阔大的诗意。“80后”校园诗人谢小青始终坚持以诗歌描摹乡村,生长于乡村的她感慨“当今的乡村一方面被落后的文化观念束缚,另一方面被

专家研讨吴景娅新作

本报(记者 王觅) 由重庆市作协、鲁迅文学院和重庆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的吴景娅长篇小说《男根山》作品研讨会日前举行。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明凯,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陈兴范及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了研讨。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主持。

吴景娅长期关注女性生存状况及女性文学的发展,此次推出的新作通过表现西南地区奕华等诸多女性数十年的命运,串连起中国现代社会命运的变迁。与会者认为,小说以其独特视角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两性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对生命意义的叩问,描述了个体生命在自我失控的境遇中所特有的孤独和茫然,进一步确证了人性残存的亮色,表达了对生活、生活、情感的感悟。小说大胆地袒露原始欲望、剖析原罪,表现出不同年龄段女性的身心体验及其如何在绝望中成长并获得自我救赎,表面看来写的是女性个体的成长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女性眼中的历史。作品情节跌宕,描写细腻,又有散文诗语言的凝练和意象,同时还展现了西部特有的自然山川和诡谲风情。

它因而需要解决潮流、趋势、趣味、风格等文艺的时代性、现实性、当下性问题,这是它“变”的一面,不变的却仍然是要坚持文艺的根本方向。当然,今天的文艺主潮事实上一直在沿着70年前确立的正确渠道良性奔涌,因而我们高兴地看到广大的文艺家和批评家们始终坚守着为民生、为大众的理想,坚守着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代言的立场,坚持深广的人文关怀,为受欺侮受侵害的普通民众呼吁发声,关爱弱势群体、关爱贫困人口、关爱农民工、关爱留守儿童、关爱灾区民众、关爱库区迁徙百姓、关爱动物、关爱生态环境……不齿于成为资本的走狗,不齿于为权势吹喇叭抬轿子,不齿于混灭道德良心的一切行为方式,我们的文艺因而还是有价值有作为有良知有底线的文艺,我们的批评也在坚持上述立场方面坚定不移始终不渝。这是文艺绝对的不变——为什么人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通知我们北京大学派文工三团来大兴纱厂深入生活,排练此剧,并在他即将赴北平去做接管工作前夕的百忙中,亲自来自纱厂给我们作者和文工三团全体演职员作政治动员报告。他从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出:过去,解放区戏剧多是表现农村题材,有代表作歌剧《白毛女》,但没有表现工人生活的话剧,而《红》剧正好弥补此缺憾。他指出,当前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国统区大城市即将陆续解放,那里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正拭目以待,要看我们解放区的工农兵新文艺,这戏负有为解放区文艺争取荣誉的意义,因此排演好此剧是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周扬的讲话,鼓舞我们感到光荣而自豪,人人发奋努力学习冲锋陷阵的精神,争取最大胜利!

此次在1949年2月春节期间在石家庄初演后,为提高质量进行大修改。在修改中,我接受了周扬提的前两点意见,但根本不理睬他的第三点,即把剧中红旗竞赛的背景改为备战斗争背景。这不是因为我掌握备战斗争素材,因为我参加了押运机器等第一线工作。而是因为,我在《红》剧中所选取的题材、主题、人物,是我从近两年的生活最深层次提取来的,表现了纱厂生活主流的真实情况,概括了革命战争的时代精神。而如果改为以备战为背景,这一切都用不上了,那是另起炉灶搞另一个戏了。正如评论家陈思和先生去年写文章敏锐指出的,那是另一出写敌我矛盾的戏了,而《红》剧是一出完全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戏。当时,我对周扬当然很崇敬,但是却认为,我们都是对党的、革命的文艺事业负责,都得实事求是,所以并不迷信他,更没有在艺术问题上一定要服从领导决定的观念。

1949年4月24日,我和三团带《红》剧来刚解放的北平,立即给周扬及文坛专家们汇报演出,周扬看后喜出望外,立即批准向五一劳动节献演,根本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接受他的意见而修改,好像他完全忘了那回事,表现了党领导创作的民主作风。那以后,就是在7月间的全团第一次文代会上,不仅受到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而且受到新解放的原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致热烈欢迎。此戏成为向新中国成立献礼话剧主要代表性剧目,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年间演遍全国。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对此剧高度重视与支持。李白钊称它为“划时代的集体创作”。茅盾称“《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看过的人没有不称赞的”。李健吾说“此剧已经可以列入世界文学之中”。夏衍说此剧在上海演出,对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起到了教育作用。郭沫若在政协第二次全委会上作《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称此剧“在上海连演一百数十场,打破中国话剧历来上演的记录”。《红旗歌》的艺术成就和演出实践效果,都充分兑现了周扬所预期的战略目标。我自认为,《红》剧创作成功的第一位的经验,是我认真践行《讲话》长期深入生活的结果,其中包括学习与运用群众语言。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关于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和必须深入生活等基本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光辉真理。今天我们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就应该在实践上而不仅仅在口头上,认真、大力继承和发扬之。

赵国增俄罗斯诗歌

本报(记者 王觅) 日前,俄罗斯杂志《我的莫斯科》发表了中国诗人赵国增的诗歌《默默地奉献》,从而使中国诗人走进了俄罗斯诗坛。去年10月,《中国作家》发表了赵国增的《淤泥》《向日葵》《写给汾河的石子》《喇叭花》后,引起了《我的莫斯科》主编的关注,她将《淤泥》意译成俄文《默默地奉献》,发表在杂志2012年第1-2期上,并拟在今后的期刊上将诗人的其他作品推荐给俄罗斯语的广大读者。此外,俄罗斯东方文学出版社对赵国增的诗集《奥运诗选》也给予了极大关注,斯维特兰娜社长表示将在年内出版这本全译本诗集。(陈亚军)

《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出版

本报(记者 王觅) 《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前沿与坐标”、“自在与自视”、“星群与版图”、“旁观与交流”、“投影与附录”等版块,通过文本、文论及影像对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归档,具有较大的信息含量,是对10年来“80后”诗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该